

魏桥方志学说的特色与价值

颜越虎

提 要：魏桥在长期的地方志工作中，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方志学说。其主要特色与贡献为：该学说贯穿一条红线，即强调志书的政治性，确保新方志的社会主义底色；来自修志实践，闪耀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光芒；源自永不停息的思考，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有其深刻性；既注重传承，更注重创新，体现出当今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关注“大志”，也关注“小志”，体现出视野的开阔性与全面性；对修志实践具有贴近、贴切、好用、管用的特点，指导性强，指导成效明显，极具生命力。

关键词：魏桥 方志学说 特色 价值

魏桥因病于2020年9月23日上午10时17分在杭州去世。魏桥去世后，笔者在微信公众号“新越绝书”、《浙江方志》上先后发表和转载《痛悼魏桥先生》《浙江地方志事业的领头雁——访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魏桥》《求真务实铸志魂——从魏桥修志实践与方志学说看浙江的地方志事业》《魏桥先生与〈浙江通志〉》等文章，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同时也表达了由衷的怀念与崇敬。

魏桥不仅是浙江地方志事业的领头雁，也是全国方志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几十年来，他为我国的地方志事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敬业勤勉，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与努力，在许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魏桥非常重视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他曾经提出，“关于新方志理论研究以致形成完整的体系”，“需要经历这样4个阶段，完成这样4项任务”^①，即新方志基本概念的研究、新方志编纂学的研究、地方志和其他有关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一门完整的新方志学。^②魏桥在《两轮修志说》自序中指出：“各行各业都应该有自己的专家，方志也不能例外。”^③魏桥是一位勤于思考的方志专家，他在长期的地方志工作中，不断研究、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方志学说。本文试就魏桥方志学说作一点简要的梳理与评述，意在更好地加以传承与弘扬，服务于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新发展。

一 强调志书的政治性，确保新方志的社会主义底色， 这是魏桥方志学说坚守的一条红线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如何在志书中记述“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魏桥曾经专门撰文，呼吁“新方志要彻底

① 魏桥：《新方志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8年6月在苏州大学地方志主编研究班上讲话》，《志苑十二年·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② 参见魏桥：《新方志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8年6月在苏州大学地方志主编研究班上讲话》，《志苑十二年·前言》，第110—112页。

③ 魏桥：《两轮修志说·序》，《两轮修志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否定“文化大革命”^①。他指出：“我们现在记叙这段历史，就是为了用事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②如果对“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过简，就难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③。所谓“纵”是指“文化大革命”的10年都要加以反映，所谓“横”是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对科技、文教事业的摧残等，都应该在新编地方志中反映出来”^④。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魏桥一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方志界值得称颂的一个标杆。

面对改革开放，魏桥很早提出“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⑤。他主张破除修志的旧观念，反映英雄辈出的时代，“要用重笔来记叙改革，充分反映改革所取得的成果”^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思考修志工作》一文中，魏桥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代新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⑦“越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越有地方志的地位；越提倡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越需要编制地方志书。”“新方志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言。”^⑧“新编方地志要适应时代的需要。”^⑨这些都是掷地有声、高屋建瓴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如果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志书中必须强化的话，那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志书中则应当高扬。魏桥强调：“利用方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项行之有效、大有可为的工作”，因为“地方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宝库”^⑩。他认为可以利用方志进行保家卫国、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热爱乡土之情等，使方志真正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教育作用。

二 魏桥方志学说来自修志实践，闪耀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光芒

魏桥在《志苑十二年》前言中写道：“1981年，历史上曾多次修过志的建德、萧山等县率先开始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新方志的工作，接着又有一些县在当地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启动了这

① 魏桥：《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② 魏桥：《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③ 魏桥：《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④ 参见魏桥：《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⑤ 魏桥：《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1986年8月在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志苑十二年》，第114页。

⑥ 参见魏桥《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1986年8月在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志苑十二年》，第116页。

⑦ 魏桥：《学习邓小平同志，思考修志工作》，《北京地方志》1993年第1期。

⑧ 魏桥：《学习邓小平同志，思考修志工作》，《北京地方志》1993年第1期。

⑨ 魏桥：《新方志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8年6月在苏州大学地方志主编研究班上讲话》，《志苑十二年·前言》，第93—113页。

⑩ 魏桥：《运用地方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

项工作。我很荣幸地被这些县聘为顾问。艰巨的任务逼着我，全新的修志工作驱使着我，使得我不敢稍有怠慢。于是边学边顾边问，可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全身心地投入。钻研理论，查考旧志，实地调查，交流经验，相互切磋，逐渐形成了一套修志的思路和志书的框架并在修志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加以修正和补充。”^①由此可见，魏桥的方志学说真真切切地来自修志实践，而且是在修志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在第一轮修志之初，《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县志以控制在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左右为宜”^②。那时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一些县志就是按此要求来确定文字量的。结果，一部县志删枝去叶，只剩骨架，失却了有血有肉的丰满内容，有的至今仍引为憾事。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编纂志书的过程中，觉得这一要求既有悖于地方志作为资料书的实际，更无法体现县志记述的对象——萧山县情的实际。针对这一情况，魏桥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与理论分析。他指出：“从首轮编修的县志来看，只有少数县志控制在50万字之内，而且评价不高。原因是首轮志书要求通贯古今，纵不断线；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确实需要相当的文字量才能完成。同时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建县早，有的建县迟；有的人口多，境域广；有的人口稀，境域小等，很难用统一的字数来框定。”^③就《萧山县志》而言，魏桥鼓励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突破框框，从萧山的实际出发，确定县志字数。《萧山县志》最终定稿为95万字，大大超过当时《规定》要求的文字量，使整部县志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一致称赞，荣获首届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萧山县志》的这种探索，正是以魏桥为代表的浙江省地方志工作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囿于以往的经验，不照搬别人的做法，作出符合浙江实际的战略抉择”^④的必然结果。

从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层面看，在20世纪80年代，魏桥考虑到浙江省各市县实际和省志办具体情况，觉得全省修志工作从市县抓起是比较可行的。“抓好重点。编志应从县抓起，先搞好县的修志工作，作出样子。”^⑤于是在全省选择了萧山、建德等5个县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逐步推开。这样做是从浙江实际出发的，因为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人们的文化素养比较高，而且历来有修志传统，许多市县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志书，可以作为新修市县志的参考借鉴和重要的资料来源，所以修好市县志具有坚实的基础。^⑥“后来的结果是市县志较快较全面地完成，并且质量大多较高，这证明我们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浙江修志实际的。”^⑦这是魏桥在总结浙江首轮修志时说的一番话，蕴含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① 魏桥：《新方志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8年6月在苏州大学地方志主编研究班上讲话》，《志苑十二年·前言》，第2页。

②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③ 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9页。

④ 课题组：《大力弘扬和培育“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⑤ 魏桥：《关于开展浙江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及建议》，《志苑十二年》，第7页。

⑥ 参见颜越虎：《浙江地方志事业的领头雁——访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魏桥》，《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⑦ 颜越虎：《浙江地方志事业的领头雁——访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魏桥》，《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三 魏桥方志学说源自他永不停息的思考， 闪烁着其思想的火花，具有深刻性

魏桥曾长期担任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杂文组组长等职，在半个多世纪的杂文生涯中，他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养成了永不停息的思考习惯。从事地方志工作以来，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不断产生具有深刻含义的思想火花，关于“详今明古”的提出就是一个代表性实例。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三条指出：“新方志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① 20世纪80年代修志工作在浙江省全面推开以后，《规定》也成为指导地方志编纂的主要文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详今略古”的方针在具体工作中却产生了一些误解与偏颇。有人觉得“详今略古”就是浓墨重彩写当代，对民国及民国以前部分应尽量简略，以致弄不清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人认为“详今略古”就是省略古的部分，略古进而变成了弃古；有人对一些重要但需花工夫查考的古代史实采取“绕道而行”的做法，略而不述，等等。有鉴于此，魏桥在全面分析、深入总结修志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89年在浙江省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详今明古”的主张。他说：“所谓‘明古’就是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对待历史，而是要求用严肃的态度，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弄个明白，弄清事物的发端、发展和变化，而不是一问三不知。”^② 后来，他又专门撰写《关于“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一文，对这一观点作了阐述。诸葛计在《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中说：“‘详今略古’与‘详今明古’，这两个提法虽只一字之差，但内涵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详今略古’包含的是量的要求，而‘详今明古’则是度的把握。对人类社会事象的记述，很难用多大的量来区分详与略，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把握。志书中对古代部分的内容，只要达到说清当时的情况，就可以说是适得其度了。”“这是本轮修志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之一。”^③ 应当说，诸葛计的评价是很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方志界对魏桥“详今明古”观点的认同与肯定。

“不越境而书”是志书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原则，但魏桥认为“对原则不能机械地去理解”^④。“修志的理论、规定、提法等只能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⑤ 1995年春，魏桥在为《泰顺县志》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而且可以突破“不越境而书”。“《泰顺县志》详尽地记述了自然环境、各类资源、各业状况，充分显示了林业、水利、茶叶、乌岩岭等具有优势的编章，同时又详记不足，展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概述’中指出泰顺与沿海平原县相比，社会、经济发展仍属滞后，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过低，1985年被列为全省五个贫困县之一，并毫不隐讳地说明‘实为五个贫困县之最’。这些记述，突破了志书不‘不越境而书’的框框，不仅有纵向比较，同时在适当的地方作概括式的横向比较，这是大胆合理的创新，不仅

①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277页。

② 魏桥：《八年修志的回顾及今后设想——在浙江省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志苑十二年》，第189页。

③ 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④ 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10页。

⑤ 魏桥：《关于“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两轮修志说》，第67页。

符合志体，而且是志体的发展。”^①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对“不越境而书”这一点，应该看到现行的行政区划，有其“定型、合理、保持稳定的一面，也有抵牾经济流向，难以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另一面”^②。因此，魏桥大胆提出：“第二轮修志既要按现行政区划为界，又不必完全拘泥于此，可以适当地越境而书。如温州人在海内外创业，外地人在温州创业都应该适当地记述。义乌小商品市场不宜光记义乌，应记其辐射到全国，到海外。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志书浓郁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③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数据：至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百万温州人，创办了3万多家企业，37万个个体工商户，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年销售额在1600亿元左右，在各地的投资累计达1000亿元以上，投资超过亿元的企业有近50家，实现年工业产值1000多亿元，创造了600多亿元的GDP，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再造了一个温州。拥有“神州第一市场”——中国小商品城的义乌，至2006年已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了20多家分市场和配送中心，商品畅销全国各地，还在南非、泰国、乌克兰等国设立了5个分市场，出口商品已占全部交易额的50%以上，销往206个国家和地区，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外商常驻义乌，境外企业在义乌设立办事机构的有478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难民署、儿童基金会等也在义乌设立了采购信息中心。^④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面对这样的现实，还死抱“不越境而书”的信条，对这些“越境而行”的现象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志书何以反映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何以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可见，坚持以现境为主，适当突破“不越境而书”的老规矩，既是客观现实对当今修志工作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又是修志理论必须适应修志实践的一个突破点。“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以不变或小变来适应时代的巨变。”^⑤“地方志工作应该从实际出发，可以按现境‘不越境而书’（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不按现境‘越境而书’。”^⑥魏桥“应运而生”地提出这样的见解，是他一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思考、善于求真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众所周知，求真务实是浙江精神最本质的内涵，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到，魏桥方志学说最耀眼的闪光点也正是求真务实。

四 魏桥方志学说既注重传承，更注重创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于创新，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指能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出有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新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活动”^⑦。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手段；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又增加了聪明才智，丰富了创新意识，从而可以更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

① 魏桥：《〈泰顺县志〉序》，《两轮修志说》，第190—191页。

② 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10页。

③ 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10页。

④ 参见颜越虎：《求真务实铸志魂——从魏桥修志实践与方志学说看浙江的地方志事业》，杨金荣主编：《浙江方志理论研究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⑤ 魏桥：《关于“众手修志”和“专家修志”的一些感受》，《两轮修志说》，第91页。

⑥ 魏桥：《抓住机遇 突破框框 越境而书——建议创修〈长江三角洲通志〉》，《两轮修志说》，第318页。

⑦ 蔡芸、文荣金：《创新能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① 文艺创作是如此，地方志编纂亦是如此。纵观当今社会，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魏桥的创新精神就是这一时代特征在地方志领域中的反映。

在数十年的修志过程中，魏桥始终主张“继承传统，大胆创新”^②，明确提出“无创新成不了佳志”^③，坚持不懈地倡导地方志的理论创新、体例创新、手段创新。首先，这是基于魏桥对中国传统方志的深入研究。地方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我国漫长的方志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他在《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一文中写道：“我国的修志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历代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修志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改革旧的形式。”^④ 其次，这是基于魏桥对传统修志观念的合理继承和大胆扬弃。他指出：“前人所说的修志‘贵因不贵创’，‘贵因’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前人修志成功的经验，合理的体例，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等都是应该继承的。”^⑤ “但是，‘不贵创’却不能苟同。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许多新事物不断涌现，不少科学的方法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所有这些都该适当地引进到修志工作中来，封闭式地修志显然是非常不够了，因此，‘贵因’更要‘贵创’。”^⑥ 最后，这也是基于魏桥先生对现实的理性思考。魏桥是一位生活态度严谨、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社会变化、思考现实问题，始终重视地方志如何全面、真实、系统、详尽地反映地方的社会变迁与现实风貌，使志书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作等重大问题（即使在他从事与分管地方志工作之前，我们也可以从他发表的许多杂文、时评中看到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关切）。^⑦ 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是魏桥创新精神的一个坚实支点。以《续志三思》^⑧ 一文为例，在第一部分“贵因尤贵创”中，魏桥对二轮修志所面临的8个方面重要的理论、现实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意见和建议。他的这些见解，给方志界同仁带来了新的启迪和新的思考。

2003年5月，魏桥又积极倡导编纂一部“贯通的、完整的、翔实的、符合学术要求的”《长江三角洲通志》^⑨，这是一个极富创新意义的设想。如果这个建议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志坛上就将诞生一部崭新的方志。由此可见，魏桥虽已年高，但思维不老，依旧充满了创新的朝气。

①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6版。

② 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5页。

③ 魏桥：《续志三思》，《两轮修志说》，第27页。

④ 魏桥：《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志苑十二年》，第117页。

⑤ 魏桥：《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志苑十二年》，第117页。

⑥ 魏桥：《用改革精神修志，修志要反映改革、促进改革》，《志苑十二年》，第117页。

⑦ 魏桥曾长期担任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杂文组组长等职，在半个多世纪的杂文生涯中，他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并结集出版《谈谈党性修养》（合著）、《谈谈批评与自我批评》《风雨四十年》等杂文、时评专集。参见乔斯人：《酸甜苦辣话杂文——与魏桥一夕谈》，杜文远、刘绍本、楼沪光主编：《杂文百家专访》，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74—80页。

⑧ 参见魏桥：《续志三思》，《两轮修志说》，第27—35页。

⑨ 参见魏桥：《抓住机遇 突破框框 越境而书——建议创修〈长江三角洲通志〉》，《两轮修志说》，第317—320页。

五 魏桥既关注“大志”，也关注“小志”， 体现出其方志学说视野的开阔性与全面性

所谓“大志”，是指省、市、县三级志书；所谓“小志”是指乡镇志、村志等非三级志书。《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使得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编纂从此纳入了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范畴，而乡镇志、村志等则未列入。

对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魏桥看得很重，抓得很牢，特别注重抓三级志书的质量。“魏桥主张省志应编纂古今贯通的志书，做到‘详今明古’，为《浙江通志》的编纂指明了方向；他主编的《浙江省人物志》等以及参与编纂的《浙江方志源流》等，为《浙江通志》相关卷的编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①他强调浙江历来有编佳志、出名志的传统，要努力把《浙江通志》编成佳志、名志。^②

另一方面，魏桥也一直十分重视乡镇志、村志等“小志”的编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源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乡村的快速消逝。而乡村志的编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揭示那种“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婴儿之间存在的继替关系”，找寻那些“后者的血脉和身躯里依旧流淌和生存着的祖辈的血液和基因”，从而为觅得“行进在城镇化道路上的中国”这个“新生的婴儿”健康成长的良方，贡献地方志的独特智慧。^③这也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良知与责任所在。

魏桥就是这样一位富有良知与责任、远见与卓识的地方志专家。他多次强调乡镇志、村志等“小志”不可小视，认为“编修村志，此举不宜低估，此事不可小看”^④。“农村、农业、农民关系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深入了解农村，如实地记录农村，着力地建设新农村，是我们一代人和几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乎此，编修村志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⑤乡镇志、村志“可以补府志、县志的不足，也就更具有实用的价值”^⑥。1984年12月，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伊原弘介等人专门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伊原弘介向魏桥讲述了他对中国乡镇志、村志重要意义的认识，希望在这方面进行更多交流与探讨。魏桥以此为例，在许多场合说日本学术界尚且如此重视中国的乡镇志、村志，我们就更应该重视这些“小志”，编纂更多、更好的“小志”。

魏桥提出包括“小志”在内的志书，应做到“要合格，又要不拘一格”^⑦。“地方志是地情书，地情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的方志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方志的千志一面讲到底是修志人员对本地的历史和现实研究不深不透。希望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静下心来，认真了解地情、研究地情，准确把握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同时注重提高自身的方志理论素养，勇于创新，不断探

① 颜越虎：《魏桥先生与〈浙江通志〉》，《浙江方志》2020年第6期。

② 参见颜越虎：《魏桥先生与〈浙江通志〉》，《浙江方志》2020年第6期。

③ 参见李培林：《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5页。

④ 魏桥：《前吴村志·序》，《两轮修志说》，第213页。

⑤ 魏桥：《前洪村志·序》，《两轮修志说》，第210页。

⑥ 魏桥：《〈浙江省名镇志〉前言》，《志苑十二年》，第307页。

⑦ 魏桥：《要合格，又要不拘一格》，《志苑十二年》，第140页。

索,使得我们二轮修志中的志书,既是质量过硬的名志,又是多姿多彩的佳作。”^①《白沙村志》在编纂过程中做了一些探索与创新,显得不拘一格,成为一部不同寻常的村志,对此魏桥给予了热情鼓励。^②

六 魏桥方志学说源于方志编纂实际,对修志实践具有贴近、贴切、好用、管用的特点,指导性强,指导成效明显,这是其方志学说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同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魏桥非常注重其学说的实用性。几十年来,正是在魏桥方志学说的引领和指导下,浙江的地方志工作者明确了前进的目标与方向,掌握了探索的武器与方法,才使得浙江地方志不断以耳目一新的变革引领风气之先,也使得浙江地方志成为广受好评的高质量志书。

1987年,《萧山县志》出版,“围垦”篇是最引人注目的篇目之一,它以升格的方法来反映萧山县的一大特色——围垦造田(“围垦使全县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使得后来的志书纷纷效仿。^③升格法成为第一轮修志中用来反映地方特色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

1991年出版的《龙游县志》,在志书的著述性和整体性上作了可贵的探索,富有创新意义。该志“在资料的取舍上重视揭示因果;文字表述上除按年记述外,加强综合记述和转折时期的记述;书中的不少无题小引起到‘画龙点睛’之效”^④。尤其是该志“注意志书的时代性和科学性。重视吸取时代先进的成果和科学的方法。如在植物和动物资源中采用两名法,以适应当代广泛的需要,并别具一格地设立《分类索引》,以方便‘用户’”^⑤。这些为后来的志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93年出版的《东阳市志》“在体例安排、记述方法上,勇于跳出常见的志书惯例和序列,将居民、方言、民俗、人物4卷列为一类,置于重要地位,既突出东阳地方特点,又顺理成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⑥。《东阳市志》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别具一格。

1995年,《嘉善县志》出版。魏桥在该志序言中写到:“《嘉善县志》中有许多可观的内容,如‘专记’一篇,详记明清时期嘉善重赋的种种实情和具体原因,寓观点于大量资料引证之中。同时专设‘和合调查’章,详尽记述当地30多年前粮食问题上发生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实情,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得到妥善解决的过程,并收录中央调查组1961年3月撰写的《嘉善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的全文。”^⑦《嘉善县志》中设立“专记”的尝试,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也为后来不少志书所采纳。

1996年出版的《绍兴市志》把资料性和著述性缜密有机地起来,强化人文内容的记述,设

① 颜越虎:《浙江地方志事业的领头雁——访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魏桥》,《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② 参见颜越虎:《〈白沙村志〉序》,《白沙村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第18—23页。

③ 参见魏桥:《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两轮修志说》,第8页。

④ 魏桥:《〈龙游县志〉序》,《志苑十二年》,第291页。

⑤ 魏桥:《〈龙游县志〉序》,《志苑十二年》,第291页。

⑥ 魏桥:《〈东阳市志〉序》,《志苑十二年》,第294页。

⑦ 魏桥:《〈嘉善县志〉序》,《两轮修志说》,第184页。

立“名家学术思想”卷，集中反映群体人物，以及编制详尽实用的索引等创新实践，给人以清风扑面之感。

1999年，《绍兴县志》出版。它深入挖掘和运用丰富翔实的资料，较好地避免了“志书有用，但又不够用”的缺憾；它在“卷首”设“绍兴史略”，附“历史年表”，做到“史志结合，彰明因果”；它“引文注意注明出处”，力求“言必有据”。这些创造性的举措，使得《绍兴县志》广受好评。^①

2002年，《浙江省民主党派志》出版。“（《浙江省民主党派志》）收集了不少当年反右派斗争时的所谓‘右派言论’，颇有存史价值，写入正文又过于繁琐，结果采用变通办法，加上注释入志，既保存了史料，又比较得体。可见在志书体例‘述、记、志、传、图、表、录’外还可加‘注’。”^②这又是和一般志书通常做法大不一样的地方，同样是一种创新。

2005年，《浦江县志（1986—2000）》出版。这是浙江省二轮修志中值得一读的良志佳作，体现了“随着时代的前进，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志书又将与时俱进，大胆突破，不断创新”^③的特点。

2013年，《萧山市志》出版。该志“不因循守旧继续走老路，而是继承传统，不断创新”^④，在开辟田野调查、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注释的运用等方面的尝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⑤

魏桥方志学说中关于队伍建设、旧志收集整理、志书开发利用、地方志工作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具体评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尽管魏桥方志学说不是一种完整、系统的理论架构，但它特色鲜明，指导性强，不仅在地方志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方志学学科建设中也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相信，魏桥方志学说在今后的地方志事业中，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永存的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魏桥：《〈绍兴县志〉序》，《两轮修志说》，第178—182页。

② 魏桥：《略论第二轮修志面临的三个问题》，《两轮修志说》，第39页。

③ 魏桥：《〈浦江县志（1986—2000）〉序》，《浦江县志（1986—2000）》，中华书局，2005年，第1页。

④ 魏桥：《〈萧山市志〉序》，《萧山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⑤ 参见魏桥：《〈萧山市志〉序》，《萧山市志》，第2页。